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基金资助

王 询 著

文化传统与 经济组织

(修订版)

本书的一个创新之处在于，作者从一种“历史选择论”的立场出发，试图通过人际关系这一极其普通却又十分重要的文化现象来揭示经济组织形式特别是企业与市场发展的文化背景与原因。既然人际关系可以节约交易成本，那么它显然就是一种经济资源。据此，作者便创造性地提出了“人际资本”的概念。人际资本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分析价值。首先，由于人际资本与交易成本不过是存量与流量的关系，因而将这两个概念结合起来可以更完整地说明人类交易过程中成本与效益变化的一般规律。其次，运用人际资本的概念还可以对经济组织的不同形式提供新的一般性解释，即各种经济组织的不同形式都可以从人际资本或人际资本的差别。第三，人际资本的概念还为深入探究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的内在联系，系统解析经济组织的文化基础提供了重要工具。所谓文化或文化传统，指的是人们在过去生活中积存下来的观念、习俗、习惯等等。它作为一种先人之见对人的行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是人们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所以文化传统至少应是影响经济制度形式的因素之一。本书用了较大的篇幅详细分析了人际关系模式对于经济组织结构及其形式的作用和影响。作者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和独创性的见解。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Cultural Tradi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F-05/6

2007

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基金资助

王 询 著

文化传统与 经济组织

(修订版)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连



© 王 询 200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 / 王询著. —2 版.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7-81122-174-9

I. 文… II. 王… III. 传统文化-影响-经济组织-研究
IV. F1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8952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总编室: (0411) 84710523

营销部: (0411) 84710711

网 址: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dufep@dufe.edu.cn

大连海大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字数: 408 千字 印张: 20 1/4 插页: 2

印数: 1—2 000 册

2007 年 12 月第 2 版

2007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宋玉平

责任校对: 那 欣

封面设计: 冀贵收

版式设计: 刘瑞东

ISBN 978-7-81122-174-9

定价: 42.00 元

本书简介

本书以跨学科的视野考察了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的影响，特别是人际关系以及两种不同人际关系模式对市场交易及企业组织的组建过程、内部关系、组织规模结构的影响。从新的角度阐述了市场交易和企业组织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分析了人际关系对市场形成和企业组织发展的作用；比较了东西方以及一些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人际关系模式；深入探讨了不同人际关系模式在东西方市场形成和企业组织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不同人际关系模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间形成的组织形式上的一些重要差异，并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做出了评价；最后分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企业、市场与政府关系上的差异。

二版序

八年前，作者将本书第一版呈献给了读者。八年来，它得到了一些学术界朋友的厚爱，特别是一些但知其姓名文章，不识其音容笑貌的学者也评介、引用了本书，对这些学界朋友和其他读者，作者充满谢意。八年中，在读者的支持下，本书第一版早已售空，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宋玉平先生乃嘱我增改内容，将本书再版。于是，八年后本书得以修订再版。书可再版实为作者高兴的事，时隔多年而尤能再版说明该书的价值所在，不似一些涂有艳丽外表的花朵，“旋开旋落旋成空”，这当然更令作者高兴。

本书此次再版，作者未改动原有的部分，而是在原书的后面，增加了四章内容。这样，全书分为四篇：第一篇是“理论研究”，包括一至六章。除第一章导言和同样具有导言性质的第二章外，余下四章是从理论上分析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形式的影响，特别是人际关系以及两种不同人际关系模式对市场交易及企业组织的组建过程、内部关系、组织规模结构的影响。第二篇为“市场交易与企业组织的历史发展”，包括第七、第八两章，这两章是在一般意义上、从新的角度阐述市场交易和企业组织的历史发展过程，特别是分析了人际关系对市场形成和企业组织发展的作用。第三篇为“东西方比较”，比较了东西方以及一些有关国家和地区的人际关系模式；探讨了不同人际关系模式在东西方市场形成和企业组织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不同人际关系模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间形成的组织形式上的一些重要差异，并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做出了评价，进

而分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企业、市场与政府关系上的差异。新增加的第四篇是“中国南北方比较”，该篇对中国的南北方传统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这种文化和结构上的差异对南北方经济组织和经济发展的一些影响，以及南北方民间社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和政府的控制力与控制方式，进而指出了这些传统上的差别对现代南北方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影响。

王 询

2007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3]

第一节 社会经济发展内容和动因的多元性 [3]

第二节 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形式的多样性 [7]

第二章 文化与文化传统 [11]

第一节 学术界对文化的重视程度 [11]

第二节 文化传统作用的二重性 [14]

第三节 文化的概念 [17]

第四节 个体层次与人际层次上的文化传统 [21]

第三章 人际关系与社会组织构成 [26]

第一节 交往与人际关系 [26]

第二节 人际关系结构与模式 [30]

第三节 社会的组织构成 [35]

第四章 人际关系与经济交易 [40]

第一节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人际关系的忽视 [40]

第二节 人际关系与交易成本 [43]

第三节 人际关系对经济交易的其他影响 [51]

第五章 人际关系与企业组织 [55]

第一节 企业组织发展的意义与性质 [55]

第二节 企业的组建成本与组织能力 [59]

第三节 组建企业的自组织方式 [61]

第四节 人际关系与企业的组建 [64]

第六章 人际关系与企业内部关系 [70]

第一节 人际关系与组织成员构成 [70]

第二节 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 [74]

第三节 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 [78]

第四节 人际关系与组织的规模 [84]

第七章 市场交易的历史发展 [91]

- 第一节 传统经济中的市场交易 [91]
- 第二节 传统人际关系对市场交易的限制 [96]
- 第三节 市场经济的形成：边缘上的发展 [100]

第八章 企业组织的历史发展 [109]

- 第一节 传统社会中的基本经济组织 [109]
- 第二节 工业化早期的家庭企业 [113]
- 第三节 向工厂制度的过渡 [117]
- 第四节 传统人际关系的积极作用 [120]

第九章 儒教与基督教的人际关系模式 [129]

- 第一节 对儒家文化历史作用的评价 [129]
- 第二节 典籍文化的比较 [135]
- 第三节 从宗教典籍到宗教生活 [138]
- 第四节 世俗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141]

第十章 东西方传统经济组织比较 [145]

- 第一节 家庭与农户 [145]
- 第二节 农户间合作的需要 [150]
- 第三节 农户间合作的社会形式 [155]
- 第四节 社会中间组织 [158]

第十一章 东亚文化传统与市场交易形式 [165]

- 第一节 东亚文化传统与市场形成 [165]
- 第二节 现代东亚市场交易形式上的特点 [171]
- 第三节 对东亚市场交易形式的评价 [177]

第十二章 东亚企业组织的发展与组织形式 [182]

- 第一节 文化传统与早发内生型企业组织发展 [182]
- 第二节 东亚现代化中的企业组织发展 [186]
- 第三节 东亚企业组织的一些例证 [190]
- 第四节 东亚企业组织的特点与评价 [196]

第十三章 东西方的企业、市场与政府 [203]

- 第一节 企业与市场的理论 [203]
- 第二节 东西方企业与市场关系的比较 [207]
- 第三节 企业、市场与政府 [214]

第十四章 南北方的人与村落 [221]

- 第一节 中国的南北方与南北方的人 [221]
- 第二节 人口迁移 [225]
- 第三节 村落聚居规模 [231]

第十五章 传统农业社会南北方的宗族 [236]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的历史变迁 [236]
- 第二节 宗族聚居“古代北盛于南，
近世南盛于北” [245]
- 第三节 南北方宗族聚居差异的原因 [252]

第十六章 传统农业社会南北方的政府与民间组织 [260]

- 第一节 传统农业社会中政府的控制力 [260]
- 第二节 宗族、帮会和教门与近代革命 [266]
- 第三节 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工商业组织 [269]

第十七章 近现代南北方的企业与政府 [276]

- 第一节 晚清和民国时期 [276]
- 第二节 计划经济时期的变化 [284]
-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 [290]

参考文献 [297]

二版新增参考文献 [308]

后记 [313]

第一篇

理论研究

第一节

→ 社会经济发展内容和动因的多元性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它的复杂性首先在于发展内容的多元性。在一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地是所有领域,包括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都发生某种形式的、或多或少的、或迟或早的变化。而且,其中各个方面的变化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一个方面的变化会对另一方面的变化发生某种带动作用,而一个方面的停滞必然对其他方面的变化起到牵制的作用。对此,很多学者都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例如,罗森堡和小伯泽尔指出:“关于经济增长是一种变化的形式的观念提醒我们,变化从不会只局限在经济领域之中,它也延伸到社会与政治领域。”^① 这也就是说,对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某种跨学科性。正如汪熙在谈到中国现代化问题时指出的那样:“这个问题所涉及的纵深度和横向面是如此的深沉与广阔,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因此,它注定是一个跨学科的任务。”^②

但是,人的认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我们没有能力完整地描述和解释全部发展过程。应该承认,对于如此庞大而复杂的事物,至少直到现在,我们仍然如摸象的盲人,在独立研究的过程中,只能对这个事物得出片面的认识。学者们只能进行某种分工,每一个研究者,只能将其视野限定在有限的范围内,各自从不同角度研究这同一过程中的不同方面。例如,经济学家,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是经济发展问题。而且,还应该承认,个人的认识受其认识能力的限制,对自己所关注的方面所得出的认识也常常是片面的。但是,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而不像摸象的盲人一样地固执己见,简单地否定别人的认识,则至少可以使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能够逐渐接近全面的认识。由于本书作者多年从事经济学研究

^① [美] 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② 汪熙、[美] 魏斐德:《中国现代化问题》,主编前言,1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的背景，自然地使本书的研究集中于经济领域。进一步说，本书研究的内容是更为有限的，它不是研究经济发展的全部问题，而是将研究的范围限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组织形式问题上。只是，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要忘记各个领域的相互关联。因此，本书不能不涉及其他领域的问题。在本书中，我将尽力保持这样一种观念：“实际上，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只有问题，所以，‘经济’和‘非经济’因素之分充其量是人为的。”^①

与发展的内容同时存在的另一重大问题是发展的动因。自欧洲社会率先由传统形态进入现代形态以来，人们便在苦苦地探索：这种发展或“现代化”的动因何在？以致发展的动因一直是有关发展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常常以两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是什么原因推动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是什么因素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停滞于传统社会形态？

佩雷菲特指出：“不发达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倒是要把发达看成是一个奇迹，而且是最近才产生的一个奇迹。”^②“奇迹”一词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对其产生的原因不甚明了，人们对发展动因的看法莫衷一是有其必然性。罗森堡和小伯泽尔曾经列举了前人对发展原因的一些解释：1. 科学和发明；2. 自然资源；3. 心理原因；4. 运气；5. 不端行为；6. 收入和财富的不均；7. 剥削；8.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9. 奴隶制度。^③也有学者将有关发展动因的观点归纳为以下几种：1. 经济推动论；2. 科技推动论；3. 文化推动论；4. 制度特别是所有权制度推动论；5. 阶级斗争推动论；6. 国家间战争刺激论等。然而，这远非以往的人们所提出的全部解释。事实上，如果要列举全部解释的清单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将使我们的复述篇幅过大，且沉闷乏味。

需要指出的是，在早期的许多研究中，对发展动因的看法常常有失片面，常常在强调某一动因时，忽视了他因素。事实上，任何一个复杂的系统都是由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构成的，而任何系统的一种深刻变化都牵涉到系统内的方方面面。社会正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即现代化则是社会系统规模宏大且极为深刻的历史变革。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每一个因素的变化本身都是整体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与其他因素的变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一般说来，社会科学家在研究现代化过程时，作为动因所提取的某一因素的变革，通常也是整个发展过程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它同时也是其他因素变革的动因。如

① [瑞典]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11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② [法] 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纪的撞击》，63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③ [美] 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7~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新制度学派曾正确地提出：科技进步、资本积累等等是发展过程本身，它们本身存在受什么动因推动的问题。然而，这一学派否认它们作为现代化动因的意义却是错误的。新制度学派把发展的动因归之于制度变革，特别是所有权的变革。对此，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提出，制度变革或所有权变革本身也存在动力来源问题。同理，其他诸如文化等因素的变革同样存在动力来源问题。

换句话说，研究发展动因的学者们常常将他们作为动因所提出的因素看作是外生变量，而实际上，它们不过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内生变量。笔者并不否认外生变量的存在，但就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说，真正的、纯粹意义上的外生变量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重要。如果硬要寻找外生变量作为其动因，则最终发现的更可能是一些通常被视为偶然的、不大引人注意的因素，或者陷入探索“宇宙第一动因”那样的哲学困境。也许，更为合理的方法论是承认内生变量作为动因的意义，将社会发展过程视为一个极为复杂的、动态的因果关系网。按照这种方法论，则前面所提到的关于发展动因的理论一般都是探索了这一因果关系网中的一个环节，尽管这一环节可能极为重要。这一观点并未否认各种理论的价值，因为任何一个学者都难以穷尽这一因果关系网中的所有因果关系，而只能截取其中的一个部分或一个环节，甚至一个环节所包含的双向作用关系中一个方向的作用及其发生作用的机理。只是，我们应该避免武断地否认其他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陷入单一因素决定论的陷阱。

可以说，在现代的有关研究中，大多数的学者都放弃了历史发展的单一因素论，而采取了多因素论，即认为发展是多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一位学者写道：“我认为现代化是各种因素的连接，而巧合在一个时间点上。”^①“琼斯（E. L. Jones）在试图说明欧洲奇迹产生原因时，得出这样一种观点：这好像一把巨大的字码锁，对于它，不是只有一把钥匙，也不是只有一种组合，它有相配合的很好的零部件足以使它起作用。”^②再如，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非常强调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育的作用，但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决定论者，相反，他甚至曾明确提出：“不是思想，而是利益（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为。”^③

在对发展观的讨论中，常常不能不提决定论与选择论这两种历史观的争论。作为一种历史观，历史决定论可谓源远流长，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多种

① [美] 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3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② [英] S. B. 里丁：《海外华人企业家的管理思想——文化背景与风格》，7页，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③ 转引自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8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多样的,^①但其基本含义是相同的:即认为有一种或若干种决定性的因素,这种或这些因素的状况决定了社会的状态及其发展变化。而且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某种“独立的变量”。极端的历史决定论排除了人们在历史发展中作出选择的余地,否定了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与历史决定论相对的历史观是历史选择论,它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人类自身选择的结果,是人类自身无尽追求的不断凝集。有些选择论者承认,人们以往的选择会成为以后进行选择的基础,从而限定以后选择的范围。极端的选择论者则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甚至否认以前的选择会限制以后的选择范围,而只考虑人们当时的选择。一般地,我们可以说,决定论是一种“客观的”理论,选择论则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显然,极端的历史决定论与极端的历史选择论都不能解释现实的历史发展。但与此同时,决定论与选择论又都具有其“合理的内核”。历史的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这些因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各种影响因素的意义在于它们决定了各种选择被人们选择的可能性,并排除了某些选择的可能性,限定了选择的范围,但是,这种限定并非将历史限定于一种可能性,没有任何一种因素或几种因素能将一个民族或国家固着于一条预先设定的航道上。或者说,这些因素的意义只是概然性的,而非必然的,它们只是某种可能性,尽管有时使某种选择被选择的可能性很大,但仍不能成为必然的。只有已经存在的才是必然的,未来则总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从各种因素的横向关系看,在发展的各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的因素都不能严格限定其他方面所具有的特征。例如,在大体相同的经济基础上,可以有不同的文化形态;相反,在大体相同的文化基础上,也同样可能出现不同的经济形态。这种对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解可以称之为“有限选择论”,即人们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但只能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中作出选择。

根据以上有关方法论和历史观的讨论,本书将研究的范围限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组织形式问题上。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推论说,不仅整个发展过程是多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发展过程中的某个具体方面,如本书集中研究的组织形式方面的特征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限定的。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者,本书作者愿意承认自己不具有全面探讨所有这些因素的能力。本书只是集中研究其中一个方面的因素,即文化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将在社会发展过程这一复杂的因果关系网中截取文化与发展中的经济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一环节,并且,在这两者的双向作用关系中,主要考虑文化对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组织形式选择的作用。应该指出的是,在这样做时,我们并不排斥其他的解释。而且,这种选择并不带有文化决定论的色彩,甚

^① 例如,从对决定因素的认定方面看,可以区分出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自然环境决定论、神的意志决定论等;从决定的程度上看,可区分出极端的和各种不太极端的决定论。

至也不意味着在文化传统与经济组织形式的关系中前者是唯一地起决定作用的一方。但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设想,没有适当的文化基础,经济现代化是难以启动的,即令经济发生了指向现代化的变动也是难以巩固、难以继为的,并且,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其组织形式的选择是受文化基础影响的。这里存在着简单明了的作用机理:经济组织形式的选择是人的行动的结果,而人的行动是受其思想、价值观即文化支配和制约的。

第二节

→ 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和形式的多样性

早期历史发展观的建立深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一度成了占支配地位的发展观。显然,这种发展观是一种单线进化观,即人类社会乃至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将踏着先行者的足迹,沿着同样的道路,以同样的形式,经过同样的发展阶段,最后达到同样的目标。直至20世纪50—60年代,这种发展观仍然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当时发表的发展研究或现代化研究的文献中充满了这种观念。例如,勒纳(Daniel Lerner)在其1958年出版的名著《传统社会的过去:中东的现代化》中说:“现代化的西方模式显示了它适用于全球的各种要素及其进程……这一逐渐形成的模式在西方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相同的模式实际上将在全世界所有的现代化社会中重新演示,而不论其种族、肤色、信仰是如此迥然不同。”^①

还应指出的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多持有类似的观念。而且,通常认为,马克思本人也具有这种观念。什洛莫·阿维内里在其《马克思与现代化》一文中对此做了很好的辩驳,他写道:“大多数作者通常把马克思关于现代化的理论写成一种简单化的单向度的观点,认为它完全是建立在一个线性的和决定论的经济增长概念上的。”阿维内里引述了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话:“当然,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对未来坚持一种决定论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一定的原因产生一定的结果,人类正沿着一条预定的道路,通过若干预定的阶段,走向单独的一个预定的终点。”该文中还引述了布莱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它“拒绝强调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多样性,不承认现代化的社会可能采取多样的形式。”而实际上,马克思本人对这样的误解曾经做过明确的回答。马克思1872年在阿姆斯特丹的演讲中,在讨论向社会主义

^① 转引自[美]马克·赫特尔:《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3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转化时说道：“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① 1877年，马克思在回击俄国民粹主义者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歪曲时写道：“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污辱。”马克思接着说道：“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②③}

由于现代化过程是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相伴随的^④，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倾向也渗入了发展的观念之中。又由于是欧洲率先进入了现代化社会，在占主流地位的现代化理论中，单线进化论通常是与欧洲中心主义相联系的。早期的现代化理论正是这种单线进化论和欧洲中心主义的结合，也即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或欧化。这种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欧洲中心主义发展观从一开始就在现代化的后来者——发展中国家，受到了来自包括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阵营的各方面的抵制。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自己的、具有本国或本民族特色的道路在这些发展中国家成了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以中国为例，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清代的大门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想到要学习西方，走西化道路，向西方学习的观念是后来才逐渐形成的，包括学习内容的扩展和持这种观念的人数增多。但是，即使在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扩大到顶点时，“全盘西化”的观点也只是极少数人的主张。^⑤中国人后来选择了走马克思指出的并以苏联为实践范例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今天，中国人选择的道路仍然是“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确如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走上现代化道路和实现现代化国家的不断增多，现实为理论家们展示了发展道路和形式的多样

①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1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② 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41～3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③ 近年来，国内也有很多文献指出了人们在这面对马克思的误解。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误解在很多人那里尚未真正消除。

④ 欧洲早发内生型的现代化过程是与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相联系的，而现代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通常也是以民族国家的独立为起点的。

⑤ 甚至持“全盘西化”论者本身也自觉不妥。如胡适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一文中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引起争论和批评后，于1935年写了《充分世界化和全盘西化》一文，申明自己过去提出的“全盘西化”“用词不当”。将“全盘西化”的口号换成了“充分世界化”。